

廣播社史

1941.12.4

民族思潮

第一卷第一期

理論的闡

揚與批判

事實的報道與分析

陝北內幕

論讀書與思想

賀譚

敵與我

關於同一原理

中國民族問題提綱

論中國青年運動

沈從文
殷福生
陳道毅

吳思琦
張徵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論讀書與思想

賀麟

就人而言，各人的性情，興趣，天才，需要不同，則各人讀書的方法，即有不同。

就書而言，則不同學科的書籍，應有不同的讀法。如讀自然科學書籍的方法與讀社會科學書籍的方法，必有不同處。又如讀文學書的方法，與讀史學書哲學書的方法，亦不盡相同。從前梁任公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選出中國幾種重要的經書和子書，提示其內容大旨，指出讀每一種書的特殊方法。更足見讀書的方法，不唯隨人而異，而且隨書而異。

因此，一人既有一人讀書的方法，一書也有一書的特別讀法。所以貴每人自己根據他平日讀書的經驗，去為他自己尋求一個最適宜，最有效率的讀書方法。而每遇一種新書，我們也要貴能考查此書的特殊性質，用一種新的讀書方法去把握它，理解它。

故本文不能精密的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書，指示特殊的不同的讀書方法。此事須有個別的指導，只能概括的就廣義的讀書的方法，略說幾句。

讀書，若不是讀死書的話，即是追求真實學問的工作。所謂真實學問，即是活的真理，真的知識。而真理或知識即是對於實在或真實事物的理智的了解，思想的把握。換言之，應用思想或理智的活動，以把握或理解真實事物，所得即為知識，真理，學問。故讀書即所以訓練思想，應用理智，以求得真實學問。讀書並不是求記誦的博雅，並不是盲從古人，作書本的奴隸。書廣義講來，有成文的書和不成文的書，對於成文的書，用文字寫出來的書，貴能用自己的思想於字裏行間，探求作者意外之意。所謂不要尋行數墨，不要以詞害意。至於不成文的書，更是晦昧難讀，更是要我們能用思想。整個大自然，整個人生都是我們所謂不

成文的書。能够直接讀這種不成文的書，所得的學問，將更為真實，更為創新，更為靈活。須以讀成文的書所得，作讀不成文的書的參考。以讀不成文的書所得，供給讀成文的書的材料。這樣，我們就不會讀死書。這樣，我們就可得真的，活的學問。中國舊日的書生，大概就只知道有成文的書，而不知道有更廣博，更豐富而有趣味的不成文的書。更不知道讀成文的書與讀不成文的書，須兼程並進，相輔相助；所以不能有真本知識，而難於得到駕馭自然，指導人生，改革社會的真實學問。所以無論讀那一種的書，關鍵在須自己用思想。

要據真實學問，首先須要有一個基本的確切認識。要確切認識：真知必可見諸實行，真理必可發為應用。要明白見得；知識必然足以指導我們的行為，學術必然足以培養我們的品格。有了真知灼見，認識透澈了，必然不期行而自行。一件事，知道了，見到了，真是會欲罷不能。著名的希臘思想家，法人羅般(Robin)說：「理論是行為的祕訣」一語，最足以代表希臘人的愛智的科學精神。所謂「理論是行為的祕訣」意思就是：要從理論的貫通透澈裏去求行為的動力，要從學術的探討科學的研究裏，去求征服自然指引人生的豐功偉績。我們要見得，偉大的事功出於偉大的學術，善良的行為出於正確的知識。簡言之，要想走上真實學問純學問的大道路，我們首先要能認識知先行後，知在行從的道理，和孫中山先生所發揮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必須有了這種信念，我們才不會因為注重力行，而反對知識，因為注重實用，而反對純粹學識，更不會因為要提倡道德而反對知識，反對科學。反之。我們愈要力行，愈要實用，愈要提高道德，我們愈其要追求學問，增加知識，發展科學。

求學應抱為學問而學問，為真理而真理的態度，亦即學者的態度，一個人不可因為將來目的在作實際的政治工作，因而把學問當作工具。須知一個人，既處在求學的時候，便應抱學者的態度。猶如上操場時，集體當有運動的精神，受軍事訓練時，就應有軍人的氣概。因為每一樣事，都有其標準，有其模範。要將一事

作好，就應以模範作為榜的。所以我們求學就應有學者的態度，辦事就應有政治家的態度。譬如，曾國藩是一個政治家，以善於治軍著稱，然而當他研究哲學時，則尊崇宋儒，因為他認為程朱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正宗。學文學則以司馬遷擬意為其模範，以桐城古文為其依歸。考證學則推崇王念孫父子；他每做一門學問，就找着那一門的模範來學，一個人在社會上作實際工作，無論如何忙迫，但只要有一個鐘頭，可以讀書，則在那一個鐘頭內，即須作純學術的探討，抱着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要能領會學問本身的價值，感覺學問本身的魅力。唯有抱着這種態度，才算是真正尊崇學術，方可以真正發揮學術的超功用之功用。

我剛才已經說過，讀書，作學問，貴自用思想。因為讀書要能自用思想才不會作書本的奴隸。能自用思想，則不可以讀成文的書得益處，且進而讀不成文的書，觀察自然，理合人生，也可以有學術的收穫。所以我首先要很簡略的講一點，如何自用思想的方法。因為要知道讀書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

關於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來討論：

一、邏輯的方法：邏輯與數學相依為命，邏輯方法大都採自數學方法，特別幾何學的方法。邏輯方法即是應用數學的方法來研究思想的概念。來理解自然與人生的事實。邏輯方法的目的在能給我們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發性的知識。換言之，邏輯方法要給我們堅實可靠，顧撲不破，內發而非外铄的知識。必定要這種知識才够得上稱為科學知識。

邏輯方法與數學方法一樣，有一個特點，就是只問本性，不問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結果好壞，滿足個人慾望與否等實用問題。只問理論的由來，不問事實上的由來。譬如，有一三角形於此，數學不問此三角形有何用處，不問畫此三角形之人的目的何在，不問此三角形是誰畫的，是什麼時候畫的，更不問畫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好的結果等。數學只求證明三角之合必等於兩直角，三角之合等於兩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質，就是一條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個人是否用邏輯方法思索

，就看他是否能掃除那個空的事實，擺脫實用的目的，而去探討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質。

中國人平日已養成只重一物之實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習慣。這種思想上的成見或習慣如不打破，將永遠不會產生科學知識。譬如：大學上「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大串推論，就是基於知識本質的推論，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推功用的方法。照這種推論，格物致知有真心誠意的效果，正心誠意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用。這種說法即使是對的，但這只是效果的研究。而效果是無必然性的，所謂成敗利弊的效果，總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識之無必然性與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論，而去作本性的探討，就可以產生純學術知識。譬如，對於格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統的研究，可成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對於致知的知的本質，加以研究，可成物知論。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學。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學。研究國天下的本性，可成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此足見要求真學問，求純科學知識，須注重研究本性的邏輯方法，而不可採取只問效果的實用態度。

邏輯方法的實際應用，還有一特點：可用「據界說以思想」，「依原則而求知」兩句話包括。我們思想不能不用許多概念。我們說話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詞。界說就是對於用的這些概念，或名詞下定義。那是指出一個概念或名詞所包括的確切意義，規定一個概念或名詞所應有的界限範圍。每一個界說即是指出一個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據界說以思想，就是要我們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確定的意義，明晰的範圍的。如是庶我們的思想可以條理而有系統。界說即是規定一物的本性，則據界說以思想即是去發揮那物的本性，而形成純學理的知識。一個人對於某一項學問有無學術上的貢獻，就看他對於那門學問上的重要概念有無新的界說。偉大的哲學家就是界說大家。偉大的工廠，一切物品，皆本廠自造，偉大的思想系統，一切名詞

，皆自己創造的，自己下過界說的。一個人能否理智的把握實在，對於自然人生的實物的本質有無真認識，而能形成足以表示事物的本性的界說。平時我們所謂思想膚淺，說話不得要領，也就是指思想不能把握本質，說話不能表示本質而言。單是下界說，也就是難事。但這也許出於經驗的觀察，理論的分析，直覺的聯繫，只是武斷的命題。要使某界說可以在學理上成立起來，頗撲不破，還要從各方面將此界說，發揮成為系統。無論千言萬語，都無非是發揮此界說的義蘊。總之，要能把握事物的本性，對於事物有了明晰的概念，才能下界說。並且要能依據界說以思想，才能構成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

至於所謂依原則而求知，就是一方面用原則原理作指導去把握事實，另一方面，就是整理事實，規定材料，使它們符合原理。不以原理作指導而得的事實，或未經理智整理不符合原理的事實，那就是道聽途說，虛幻無稽，模樣影響的事實，而不是有學理根據的科學事實。先從特殊的事實去尋求解釋此事實的普遍的原則，次依據此原則去解釋其他同類的事實，就叫做依原則而求知。我們之相信一件事實，不僅因為它是事實，乃因為他合理。我們之注重原理，乃是因為原理足以管轄事實，以簡駁繁，指導事實。總之，有一事實，必須能找出解釋此事實的原則，有一原則，必須能指出符合此原則或指導此定律的事實。必定要這種知識才有學術價值，才是科學知識。所謂科學的實驗，就是依據理性的原則（有時叫做假定）去考驗事實是否遵守此原則。所謂科學的研究，就是依據原則去搜集足以表明，發揮或修正此原則的事實。單研究事實而求不出原則，或不根據原則而任意去盲目的嘗試，糊亂的推舉事實，均不能獲得科學知識。

二、體驗方法：體驗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體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須設身處地，用同情的態度去了解之。體驗法最忌有主觀的成見，貴忘懷自我，投入認識的對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潛的觀察。體驗本身即是一種生活，一種精神的生活，因為所謂體驗即是在生活中去體驗，離開生活更無所謂體驗。

體驗法即是教人從生活中去用思想。體驗法是要人虛心忘我，深入事物之內在的本質或命脈，以便會欣賞其

意義與價值，而不從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寫或概觀。體驗是一種細密的，深刻的，親切的求知方法。體驗即是「理會」之意。所謂理會即是用理智去心領神會。此種方法，用來體察人生，欣賞藝術，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創造，特別適用。宋儒最喜歡用體驗。宋儒的思想可以說是皆出於體驗。而朱子尤其善於應用體驗方法以讀書。他所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深沉潛思」「優遊玩索」皆我此處所謂體驗方法。

三、玄思的方法：所謂玄思的方法，也可以說是求形而上學的知識的方法。此種思想方法，甚為難言。最簡易的講來，可以謂為「由全體觀部份，由部份觀全體」之法。也可以稱為「由形而上觀形而下，由形而下觀形而上」之法。只知全體，不知部份，則陷於空洞。只知部份，不知全體，則陷於支離瑣碎。必由全體以觀部份，庶各部份可各安其份，各得其所，不致爭執矛盾。必由部份以觀全體，庶可見得部份的根本所寄，歸宿所在，而不致執著一偏。全體有二義，一為複多的統一，一為對立的統一。就複多的統一言，全體為萬殊之一本。就對立的統一言，全體為正反的綜合，矛盾的調解。全體與部份息息相通，成為有機的統一體。譬如，由正而反而合之辯證歷程，即是由部份觀全體的歷程。反之，由合，由全體以解除正反的矛盾，以復回雙方應有的地位，即是從全體觀部份的歷程。譬如，讀一篇文字，由一字一句以表明全篇的主旨，此由部份觀全體之法也。由全篇文字的主旨，以解釋一字一句應有的含義，此由全體觀部份之法也。如朱子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達到豁然貫通的境界，事物之本末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能由部份而達全體，由支節達貫通，由形而下的一事一物而達形而上的全體大用也。又如朱子復能由太極之理，宇宙之全，而觀一事一物之理，而發現本末精粗一條理井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即是由全體觀部份而得之境界也。

總結起來說，我們提出的三種思想的方法，第一種邏輯的方法，可以給我們條理嚴密的系統，使我們不敢支離散漫；第二種體驗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的學問有親切豐富的內容，而不致乾燥空疏。第三種玄思的方

法，可以使我們有遠大圓通的哲學識見，而不致執着一端。此處所謂邏輯方法完全是根據數學方法出發，表示理性的作用。此處所論體驗，實包含德國治文化哲學者如狄爾泰（Dilthey）等人所謂「體驗」和法蘭克福派格森所謂直覺。此處所論玄思的方法，即是最平實最簡要的敘述一般人所謂辯證法。此種用「全體觀部份」，「部份觀全體」的說法以解釋辯證法，實所以發揮黑格爾「眞理乃是全體」之說的精義，同時亦即表示柏拉圖認辯證法為「一中見多，多中見一」（多指部份，一指全體）之法的原旨。這三種方法並不是彼此孤立而無貫通處，但其相通之點，殊難簡單說明。概括講來，玄思的方法，或真正的辯證法，實兼具有邏輯方法與體驗方法而自成為尋求形而上學的系統知識的方法。

知這了一般的思想方法，然後應用思想方法來讀書，那真是事半而功倍。

第一，應用邏輯方法來讀書，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討論的題材的本質，並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說，是否有系統的發掘，所建立的原則是否有事實的根據。所敍述的事實是否有原則作指導。如是就可以判斷此書學術價值的高下。同時，我們讀一書時，亦要設法把握一書的本質或精義，依據原則，發疑問，提假設，制範疇，用種種理智的活動以求了解此書的內容。

其次，應用體驗的方法以讀書，就是首貴放棄主觀的成見，不要心粗氣浮，欲速助長，便使自己沉潛浸潤於書籍中，設身處地，切己體察，優遊玩索，虛心涵泳。須用一番心情，費一番神思，以審美，以欣賞藝術的态度，去讀書。要感覺得書之可樂可好，智慧之可愛。把讀書當作尚友千古與古人晤對的精神生活，神遊冥想於故籍的寶藏裏，與聖賢的精神相交接往來，即從這種讀書的體驗裏去理會，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華，去體驗古人真意，去紹述古人絕學，去發揮自己的心得。這就是用體驗的方法去讀書，也可以說是由讀書的生活中去體驗。用這樣的讀書方法，其實也就是一種涵養工夫。由此而深造有得，則其所建立的學說，所發出的議論，自有一種深厚純粹中正和平之氣，而不致限於粗疏淺薄激浮惡。

第三，應用從全體看部份，從部份看全體的方法以讀書，可以說是即是由約而博，由博返約之法。譬如，由讀某人此書，進而博涉及此人之其他著作。或由讀此人之著作，進而博涉及與此人有關之人之著作（如此人之師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著作）皆可說是應用由部份到全體的方法。然後再由此人師友等之著作，以參證以解釋此人自己之著作，而得較深一層之了解，即可說是應用由全體觀部份的方法。此外如由整個時代的文化以觀察個人的著作，由個人的著作以例證整個時代的趨勢，由某一學派的立場去觀察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某一學派的宗旨，由全書的要旨以解釋一章一節，由一章一節以發明全書的精義，均可以說是專用由全體看，由部份看，多中見一，一中見多之玄思方法以讀書。

此法大概用來觀察歷史，評人論事，特別適用。因為必用此法以治史學，方有歷史的透視眼光或高瞻遠矚的態度也。由部份觀全體，則對於全體的了解方親切而具體，由全體觀部份，則對於部份的評判，方持平而切當。部份要能代表全體，例證全體，尊從全體的規律，與全體有有機關係，則部份方不陷於孤立，支離，散漫無統紀。全體要能決定部份，統轄部份，指導部份，則全體方不陷於空洞，抽象，徒具形式而無內容。

因為此種玄思的方法，根本假定著作，思想，實在，都是一有機體，有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首則應。故讀書，了解思想，把握實在，須用以全體觀部份，以部份觀全體的方法。

總之，我的意思，要從讀書裏求得真實學問，須能自用思想不唯可讀不成文的書。而且可讀不成文的書。知道如何自用思想，有了思想的方法，則讀書的方法，自可細尋推演出來。必定要認真自己用思想，用嚴格的方法來讀書，方可以逐漸養成欣賞真實的學問，研讀偉大著作的勇氣與能力，即不致為市場流行的發揚應時，耳食襲取的小冊子所蒙蔽，所欺騙，一般青年之喜歡讀小冊子，容易為小冊子所鼓動，其原因無他，即在於不肯自用思想，未能認真用嚴格的方法以讀書，而不知道真學術惟有持堅苦着力，循序漸進，方能有成

，實不能取巧，亦無捷徑可循也。

末了，我還要說幾句關於書的價值，讀書的神聖權利，和讀書的搏鬥精神。

人與禽獸的區別，雖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根據科學的研究，都只有兩點：1.人能製造並利用工具，而禽獸不能。2.人有文字，而禽獸無文字。其實文字亦是一種工具，傳達思想情感意志，精神上人與人內在交通，傳行久遠的工具。說粗淺一點，人是能著書讀書的動物。故讀書是劃分人與禽獸的界限，也是劃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界限。讀現代的書即所以與同時代的人作精神上的溝通交談。讀古人的書即所以承受古聖先賢的精神遺產，讀書即可以享受或吸取學問家思想家多年的心血的結晶。所以讀書實人類特有的神聖權利。

要想不致要此種神聖權利，堂堂地作一個人，我們唯有努力讀書。讀書如登高山，非有勇氣，絕不能登至高山頂，接近雲霄。讀書如撐船上灘，不可一忽鬆懈。讀書如臨戰場，不能戰勝需輸，利用書籍，即會為書籍所役使，作書本的奴隸。朱子說：「讀書須一棒一條痕，一爛一掌血。」最足以表示這種為戰陣的讀書精神，且足以作我們讀書的指針。

敵與我

沈從文

今年是民國三十年，若就個體的年齡說來，正是一個人精神與肉體同時發育完成，準備從社會學與生物學兩種意義上負責盡職的年齡。古人說「三十而立」，稱為「壯年」，就是這個意思。「大可有為」是這個年齡用於個人的讚頌，其實也適於用作國家的讚頌。

中國現在是戰時，是集中全個民族人力與財富，智巧與勇氣，來與一個極強殘忍而又狡詐陰狠的鄰邦周旋拼命時。三年半的經驗，證明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即無鄰所加于我們的憂患，分量雖然並不輕，然而

近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這個民族所產生的一點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用戰爭來作試驗，實在擔當得起這分憂患。戰爭去結束時期尚遠，除了少數精神不健全的份子，向敵人投降，大多數中國人，即在淪陷區內，都無不對這件事認識得極其明白，承認任何犧牲來歸，還將繼續沉默忍受下去，在忍受中並且相信：勝利必屬於我。中華民族決不是做奴隸的民族，不特要在惡劣環境中求生存，同時還要在這個環境中求發展！

在前方，目下敵人軍事上已感到束手，無可為力了，因此即用一種卑劣戰術，與小島民族性相稱的戰術，向中國後方不設防城市作普遍轟炸。一面殺中國平民，一面還用無線電廣播，或散發聲傳單，作種種可笑宣傳，向中國平民說謊，企圖引起一點作用。這種又下流又糊塗的手段，正和在淪陷區殘殺中國人後，再送點小糖果給那些無父母中國小孩甜口，就以為即可同中國人講親善情形一樣。一切努力除增加中國民衆的切齒，則無意義。使他們這麼作，正證明自近衛以次，敵人的支那通，實在完全不明白現代中國抗戰為何事。

一個朋友對於日本的支那通，批評得極有意思，以為這些自命支那通的人物，照例只懂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化，清末民初時代的政治，此外中國較遠一點的文學藝術，所表現這個民族的偉大感情偉大思想，照例不大明白。較近一點的文學藝術，如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由於這個運動所煽起的愛國熱情，以及對於民族復興國家重建的信心，尤其十分隔閡。不懂古代中國，至多這只是附庸風雅時，見出一點小家子相，玩弄器只知買均密，玩字畫只知賣夏圭牧谿，雖不免寒俗，還不算大失敗。至于不明白現代中國，到處理中日事件時，見武力不能征服，就只是用他本國流氓來勾搭中國流氓，流氓和流氓混在一處，這裏來個委員會，把中國讀來個偽組織，即以為可以分割而成功。其實這種拙劣方式，在政治上還絕對會失敗。失敗原因簡單，即敵人把現代中國的能力完全估錯了。別的不說，即以文學革命而言，將文字當成工具，從各方面運用，在中國讀

書人方面，近二十年來保有了若干潛力，遠在東京派兵百萬到中國，用戰爭磨國運的近衛，就根本不明白的！

這件事即從當前本地情形說來，也可看出一二。敵人總以為在華南方面，更不宜作軍事冒險，却無妨作政治投資。用語言挑撥離間，可以分化上層分子。飛機轟炸以及封鎖漢越貨運，錢物價高漲，可以推動下層分子。至于中層分子，却聽其神經受前者影響，生活受後者影響。此等情形挨到一年半載，軍事方面縱無結果，政治方面必會有很大收穫。其實支那通的白日夢到頭來還是毫無作用。挑撥離間的方法，可一不可再玩了，只成爲笑話。飛機轟炸毫不害怕，物價上漲則反而好了有乘下層，就中情緒不大安定，生活相當困難的，是中層分子，階級一點說來還只限於薪水階級的教書先生。然而，在心理上反日與敵人決無妥協思想的，也就正是這部分中層分子。物價越漲大家生活越加簡單，把戰爭亦看得很單純而自然，「打下去，忍受一切，在任何情形下決不投降！」這只看看在幾個大學校服務的同人生活狀況，便可明白。一個優秀圖書館員的薪給，不如某委員會的門役，他忍受。一個學有專長的教授薪給，不如昆明市的理髮師和洋車夫，他同樣忍受。使這些讀書人能忍受的理由，是大家都透澈瞭解這次戰爭的意義，對於民族存亡問題實太嚴重。戰爭既是爭國格，爭民族人格，並為世界民主制度爭取人類生存一個不可少的莊嚴名辭，即「正義」。這事從有知識的中層分子看來，當然是要無條件的長期忍受下去的。

忍受不是最終目的。在中層分子中，必更能看出這個民族未來的命運，凡事值得樂觀。目前我們正在犧牲中抵抗敵人所加于我們的憂患，明天還得從努力中想法擴張敵人的武力。我們不僅在焦土抗戰，還要從瓦礫中建國！

不過目前抗戰要人力和物力，智巧和勇氣，我們從各方面取齊都不缺少。明日建國却似乎更需要較多的準備。提到準備，使我們想起一件事，即不管幸運是否，事實上這點責任已落到當前二十歲到三十歲

左右的中國讀書人頭上上建國不特需要知識，還需要比知識更多的做人做事的勇氣三十歲左右的人不用說了，即目下在大學念書的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十年二十年後，也就必然是這個民族歷史上的悲壯場面負責者。這些人在負責「做人」以前，如何來養成「做人」的氣概？這件事在當前實在是值得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做人問題很多，要聚精會神地把生命看得異常莊嚴，凡事處之以誠與敬，思索向深處走，充滿熱情與勇敢，來從書本與人事兩方面，追究瞭解人之所以為人，究竟特點何在。就生物學說來，人比較上是個如何複雜的動物。雖複雜依然脫不了受自然的限制，因新陳代謝，只有一個短短的時期活到陽光下。（願望永生，肉體終不免要死亡。）然而從人類文化史上看來，這生物也就相當古怪，近萬年來知識觀念的堆積，而且傳遞不絕，即是一種奇跡。近百年來種種知識因工具便利而運用得法，更產生多少奇跡！我們如能明白人之所以為人，獸性與神性如何同在並存，就一定會承認，如果處理得法，世界會有個較好的明天的。便這個較好明天實現的方式，必需許多正在活着的人，活下來，像個人，且肯努力貼近「神」，方有希望可言。做一個中國人尤其任大而責重。想戰勝強悍敵人，還先得從征服個人的弱點起始。青年運動若懂得再來一回，「重新做人」是這個運動最合理的口號。

這「做人」意見說來雖極淺顯，作來倒也相當費事。正因為人與猿猴本來有一點遠親，雖相去已百十萬年，這個世界却照例到處可以發現獸性的遺留。即以中國讀書人而論，明分際知自重能愛國的固不少，活下來所作，所為，所思，所願，都顯得懶惰而小氣，平凡而自私的數量似乎也就相當多！這些人對於舉凡一切表示人類向上的理想與事實，照例是不大關心的。舉凡一切表示人類偉大處，崇高處，深刻處，也都不怎麼需要的。過日子儼然只是吃喝生殖與死亡，然而即屬於吃喝生死問題，便依然不能向深處思索，只是在一種極端庸俗打算中浮沉。一生所讀的書雖極多，亦不能幫助他把人生看得較深刻。這些人情緒上竟像是與猴子相差不多，都甘心樂意一生在地上爬行，還以為手足能同時貼地，走動時又穩當又便利，並且姿式非

常瀟灑而美觀，但另外自然也尚有一種人，明白人類之所以進步原因，主要的事是在多少萬年前，即已能從青青梁骨，抽出兩隻手來供頭腦指揮，充滿好奇的興趣，發明的欲望，更抱着一顆戰勝一切的雄心與遠志，來從事各種工作各種試驗，方有今日的成就！我們這個民族今後命運的榮枯，實決定在這兩種人生型式的消長。一個現代中國人，如能够對於這兩種人生型式的美惡，認識得清清楚楚，知道有所取捨，學做人的事就不成問題了。

民國三十年一月七日昆明

關於同一原理

殷福生

甲是甲、又是非甲？

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中有一條原理叫做同一原理，這一條原理在一種潮流中常被許多人反對或是以爲它肯定世界底事物不變，我們現在要將這一方面的誤解加以指正。

首先，我們要看同一原理底陳辭是怎樣的，根據古典邏輯學底說法我們得知同一原理底陳辭是「甲是甲」。」「甲是甲」是什麼意義呢？我們必須予以確正的說明。不然，誤解就發生了。

這裏的「甲」並沒有指稱或是特指那一個有元，而是泛指任何可能的有元。凡屬泛指任何可能的有元的指辭——這也就是說，以任何可能的有元爲肯定值的指辭——就是任指辭。「甲」所表示的是任指辭。因此「甲」是表示任指辭底一個符號。古典邏輯學底目的是圖藉着它明文地告訴我們當思維某有元時我們底思維必須一致地定著於對某有元的思維。

這樣的三個原則是有効的麼？假若我們要證驗這個原則是否有効，那末我們必須看它對於它所被引用的

情形是否有効，假若它對於它所被引用的情形是有効的，那末它便是有効的。否則，它便是無効的。它所被引用到的情形是：任何事物，任何變動，部分變動，意義可能。我們現在來看同一原理對於這四種情形是否一概有効。

既然「甲」祇是表示任指辭的一個符號，而且它所可以指稱的並不限於這個有元或那個有元而是泛指的任何有元，於是「人是人」，「山是山」，「紙是紙」，……都可以是「甲是甲」這種普遍的表式底特例；絲毫拘束也沒有。這可見同一原理對於任何事物可以引用，既然同一原理對於任何事物可以引用，於是它對於任何事物是有効的。

在事實上，世界上許許多可被思維的客觀具體對象在時間空間中變動。這是一種極其顯而易見的現象，從古至今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當然用不着爭辯，可是，對於這種變動，「甲是甲」可以適用麼？

毫無疑義，一樣地可以適用。我們必須分別清楚：可被思維的客觀的具體的對象無論怎樣地在時空中變動，這是它自身底性能，人類對於這種變動去加以思維，這是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知识作用之一種，二者各不相依，互相獨立，不可混為一談。例如，我們用顯微鏡來觀察布朗運動時，分子底運動和顯微鏡之如何移動完全各不相干，然而，可被思維的客觀的具體對象無論怎樣變動，我們總可以用語言文字來形容它，既然她可以用語言文字來形容它，於是對於種種不同的變動，我們可以相應地用種種不同的命辭來表示，既然我們可以相應地用種種不同的命辭來表示，於是我們底命辭所說斷的不是肯定便是否定，於是我們底命辭所說斷的不是既肯定又否定，也不是既否定又肯定。既然是這樣，於是就是引用了「甲是甲」，既然引用了「甲是甲」，於是同一原理對於任何變動也可以引用，因而也是有効的。

也許有人說：一隻毛蟲，固然是隻毛蟲，可是它後來可以變為蝴蝶，因此，豈不是可以說「毛蟲是非

毛虫」麼？如果「毛虫是非毛虫」可以說，那末「甲是非甲」豈不是也可以說嗎？如果「甲是非甲」可以說，那末「甲是甲」豈不是不必常真嗎？

不可能的！當着一隻毛虫還是一隻毛虫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隻毛虫，當着一隻毛虫變成了一隻蝴蝶的時候，「這是一隻毛虫」這句話不適于形容它，於是我們可以拿另外一句話來形容它，說「這是一隻蝴蝶」。宇宙間有千千萬萬的事物，有千千萬萬的變化，於是我們人類拿千千萬萬的語言或是文字去形容它們，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地了解客觀世界。「毛虫是非毛虫」，不猶毫無意義，而且是自相矛盾。

如果某事物有一部分在變動而另一部分不在變動，那末「甲是甲」適用麼？一樣地可以適用。如果某事物有一部變動而另一部分不在變動，那末我們便說「某事物之在變動中的部分是在變動，某事物之不變部分是不變的。」這還不是引用了「甲是甲」麼？既然是引用了「甲是甲」，於是可見同一原理對於事物之一部分變動或是另一部分不變的情形也是有效的。

總括起來說：同一原理要求我們說，是什麼就是什麼，是怎樣就是怎樣，是變動就還它一個變動。它對於客觀世界內容無有絲毫迴拒，它只是人類思維活動中最基本的作用之一而已，所以它並沒有肯定世界底事物不變。

或許有人要懷疑，這樣的原理有什麼用呢？假若從正面着想，那末不容易發現它底功用。然而，假若從反面着想，那末就比較容易發現它底功用了。

我們試設想不遵守同一原理，那末我們底思想底語言便立刻發生矛盾，如果發生矛盾，那末毫無意義可言。例如，我們說「國家又不是國家」，我們說「三民主義又適合於中國又不適合於中國」。這一類的話完全自相矛盾，毫無意義。其結果不獨思想混亂，而且行為也因之而錯誤，例如，同一三民主義，它在中國始終有效，而許多人則昨天反對它，說它是「胡說狗屁」。可是，今天上午看看形勢不好，於是便宣言「三

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然而今天下午勢力膨脹起來，又反對三民主義，說要「革命的三民主義」，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是「不革命的」。諸如此類顛三倒四，反覆無常的事，不一而足，這都是不守同一原理底具體表現。

假若我們要思想語言不矛盾而有意義可能，那末必須遵守同一原理，如果客觀世界被我們思維的時候是什麼，我們一致地說它是什麼，客觀世界被我們思維的時機是怎樣，我們一致地說它是怎樣，而不既說它是什么又說它不是什麼，或者既說它是怎樣又說它不是怎樣，那末我們底思想語言便有意義之可能。復次，如果思想語言有意義之可能，那末我們底行為便有定向之可能；而不至反覆無常了。例如，如果我們認三民主義在中國底歷史中和環境中是適合的，那末在這個時間和空間裏我們就要始終一致地為它之實現而奮鬥而犧牲。

由此可見同一原理又是意義可能之原理，沒有同一原理，便沒有意義之可能了。

從以上的討論裏，我們可以知道同一原理對於這四種情形都是有效的，既然同一原理對於這四種情形都是有效的，於是我們也就驗證了同一原理底本身也是有效的。

雖然，我們已經驗證了同一原理底本身是有効的，然而同一原理是否因此而不可反對呢？同一原理是根本不能反對的。因為，假若我們反對同一原理，那末便立刻陷於自相矛盾之境。

假若有一位獨裁的陰謀魔王說：「我反對同一原理，趕快把主張同一原理的叛徒們殺掉。」當着陰謀魔王說話的時候，主張同一原理的人們也許被害了，然而這位魔王還是乞憐於同一原理之門前了。假若那隻魔王希望他所說的是一句有意義的話，而且他底爪牙殺了以後知道他底意義照樣去舉行，那末他所說的「我一定是「我」，決不會同時又是「非我」，「反對」一定就是「反對」，決不會同時又「不反對」，「同一原理」一定是「同一原理」，絕對不能是「非同一原理」，而是什麼別的原理。結果合起來就是「我

反對同一原理」的確是「我反對同一原理」，而不是別的。我們把「甲」代入，不就是「甲是甲」嗎？在反對同一原理的時候，又無意地引用了同一原理，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從前面一番簡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知道同一原理在一方面是一個有効的原理，同時在另一方面是一個根本無可反對的原理。假若我們把以上所說的意思明瞭了，那末便也可以明瞭在一種潮流中的人們對於同一原理之反對是怎樣地不通，對於同一原理之誤解是如何之甚！

中國民族問題提綱

陳道毅

大凡一個問題的提出，必是一種要求得不到滿足，以求解決的方法。這種方法表現在實際政治上者，即是一種主義。中國自一八四一以來，百弊叢生，問題紛起，孫總理歸納此諸問題成爲三種：

- 一、民族外受列強政治與經濟的壓迫；
- 二、清廷政治之腐敗；

- 三、人民的生活不能解決。

針對此三問題的解決的方法，就是三民主義。明瞭主義的這一意義，就知道時下一般誹謗或曲解三民主義者，或謂其無哲學基礎，或謂其理論膚淺，均屬皮相之見。不足爲「主義」病。我們即使要批評三民主義，亦應該先對三民主義要解決的問題，分別剖析，看它是否的確爲今日中國之必需。不可見異思遷，徒呼前進，妄信空論，而對於真實的問題，反棄實不顧。最可惜者，二十年來，中共因不認識此點，以至於盲目鑽動。可憐參痛的結果，深足證明此點之重要，因此我們對各問題，須詳加討論，現在我們的討論須自民族問題始。

一、何謂「民族」

「民族」二字，英文為 Nation 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是過去的觀念；乃就民族之「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各種因素來解釋（見民族主義第一講），由這些因素組織的人羣，在原始時代首先由血統關係組成民族社會由民族社會進為國家社會由國家社會再進而為部落，部落由於歷史的發展，成為民族系統。如歐洲的拉丁條頓，亞洲的漢族，土耳其等民族皆是。這一種觀念是由血統觀念演進而來。

第二種是近代的觀念，近代所謂民族，已不復依照上述的範圍，如瑞士民族中也有法國人德國人。然而瑞士民族中的德國人與法國人，與德國民族中的法國人。並無精神上的聯繫，自己形成一個瑞士民族的集團，所以釋義解釋「民族」，即注重其地理單位，以及是否能組織成獨立的政府兩個條件。

這兩種說法比較起來，後一觀念也許與傳統的觀念相差太遠。然而近代民族問題的產生，與我們所要談的民族主義，都是屬於這一範疇的，因為第一種民族的範圍：由於近世各人種的散居和參雜，民族內已無精神的聯繫，「民族」二字已成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沒有組織的可能。所以威爾遜在上次歐戰後所倡的「民族自決」，終成泡影。實在說來第二種觀念，因其範圍求與國家的範圍吻合，應稱為「民族國家」。因為孫中山將它稱為「民族」，我們為別於第一種觀念起見，稱它為「民族」，而將第一種觀念稱為「種族」。

二、民族問題的一般性
歐洲自維也納會議以後，「民族國家」相繼興起，「民族主義」成為一種神祕的力量，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已成現代一種普遍的需要，這種需要的能力，滿識與否民問題，也就是所提「民族問題」之可能解決與否底問題。如果我們把近世歷史上的民族問題分析一下，我們便可以看出：在解決這個問題底過程中

、一方面是指標的建立民族國家的運動。另一方面是民族國建立運動中的反動勢力。前者乃是民族問題提出的動因，後者乃是民族問題提出的阻力。此二者的衝突就構成全部的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提出的動因，學者底意見，殊不一致，最少我們可以歸納成爲三種：

第一種意見是就政治觀點來看民族問題：這種觀點著重在近代民族觀念中有獨立自主的政府這一條件。如穆勒在其論代議政府中說：「一部分人類，倘使他們中間有共同的情緒，把他們聯合起來，可說是組成一個民族，這種情緒在他們以外的人羣中間，並不存在，他們彼此間比較和其他的人民願意合作，願意有同一的政府，並且願意自己執政，或由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爲政」。穆勒的意思：所謂民族之組織不過爲了管理的需要，爲了使一部份人成爲一個政治的單位而已。

第二種意見是就經濟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的：這種觀點著重在近代民族觀念之階級的意義，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其共產主義者宣言中寫道：「現在的政府不過是一個資產階級事務行政委員會」。從這種輕蔑的態度來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的組織」，乃是因爲他們認爲近代「民族國家」成立的原故，是由於資本家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專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也就是說：「民族國家」不過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存在。

第三種意見是就民族發展的本身來說明民族問題：這種意見也可以說是一種從全體的綜合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的，他們認爲「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個人爲了實現其「人格」「意志的自由」「道德的目的」而結合成爲近代化的民族國家。

這三種意見比較起來，第一、二兩種都有倒因爲果的錯誤；第一種意見認爲有了管理人管理制度的需要才結合成爲民族，然而實際上是有民族結合的要求以後才有政治組織。第二種意見以爲有了階級需要保護其利益才結合成爲民族，可是從歷史上看，在人類沒有任何組織以前，決看不出階級的對立，那就可以證明是有了組織之後才有階級的發生，才有階級利益的發生。這樣看來：第一、二兩種意見都不正確。那麼第三種意

是否正確呢？我們可以詳細的討論一下：

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發達，由於「個人」的重被發現，特別的看重「自我」，因而產生了極端的個人主義，把這種個人主義擴充到民族主義，從意識「自我」之存在擴張到意識「整個民族」之存在，就形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這種由自我意識而產生的民族意識，就其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即從笛卡兒以來，把心與物區別，把人同我分開，由於發現了人以後，更進一步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但當時還許多的自我為獨立的，中間沒有聯繫，到了康德乃發現一超個人的「自我」曰，意識一般，*Bewusstsein* *Liberhaupt*。這個「大我」具有人格，因此多數的「自我」才得到調和，而能建立一個共同生活的基礎。康德之後，菲希特繼之，將「知我」附屬於「行我」，「自我」乃更得一完整的統一。一直到黑格爾將此自我絕對化，客觀化，就形成了民族國家之絕對的觀念，他把民族看成一個「倫理的全體」；在這個「倫理的全體」中，個人可以實現其意志自由，在這個「倫理的全體」之外，各民族可以實現其意志自由，所以黑格爾說：「國家是人類開明的自覺，真正的意志，並且能思想和明白自己」。至此民族的意義才得到最完美的解釋。

嬰兒初生，只和到許多的事物，不明白有「我」的存在，據心理學家說，要到相當時期，才能明白「我」字的用法，這一點頗似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發現「民族意識」的事實。歐洲自法國大革命以後，人權宣言上定立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原則，由於這種個人主義極端的發揮，乃演成雅各賓黨人的殘殺主義，恐怖的結果使個人主義得以修正，拿破崙興起，乃運用他底軍事天才，組織近代的民族國家，拿氏征服歐洲，將這一點「民族國家」的觀念，傳播到歐洲全部，維也納會議以後，於是近代的「民族國家」相繼興起了。這種民族國家，實為目前人類政治精神最高的一種表現，實為人類最高的集團組織。「民族國家」的建立，實為人類理性上的要求，「民族國家」為人類的最大目的。

其次，就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的阻力這一方面來看：這一點學者討論的頗少，即或有之，也是非常支離

破碎。從歷史的事實上看來，在建立民國家過程中的阻力有兩種：一種是內在的阻力，另一種是外在的阻力。內在的阻力，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因為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是割據的分裂的，反統一的，這種制度和思想的擁護者為了保存其割據的形式，根本就不欲民族國家之完成，因此他們極力破壞民族國家之建立，極力排斥民族國家思想之發展。至如弱小民族，除了有內在的阻力以外，更有外在的阻力，就是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壓迫。帝國主義者的目的：就在以政治經濟文化種種手段來攫取弱小民族的種種利益。既是如此，當然不能讓一個弱小民族有自主的權力和自主的政府。所以反帝和反封建就是達到建立民族國家的必要步驟。也就是說：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必須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消滅封建勢力。

以上我們把民族問題的一般性作了一個概括的討論。以下我們將要討論中國民族問題的特殊性。

三、中國民族問題之產生

中國近百年，革命運動迭起，考其本質，都是民族革命。換言之，民族革命在中國革命的全體意義之下作了最必要的因素。如果我們要明白中國革命，就要先瞭解中國的民族革命，但是在討論民族革命之先，必得將民族革命背後的民族問題，加以分析：

就中國民族問題產生的時間上說：應從何時起？過去有兩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即認為自公元前四世紀以後——即周末時代——就有民族問題的發生，如陶希聖說：「封建時代（公元四世紀以前）有『種族』沒有『民族』」，公元前四世紀以後，以貴族士人階級為中心而種族融合為民族，所以民族政策不外是士大夫階級政策」。（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第二種看法：即認為中國至一九二七前不久始有嚴重的民族問題的提出，斯大林論中國革命之三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是廣州時代，那時革命的目標，主要是打擊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支持革命運動的」。

照第一種看法，陶先生固然知道「民族」與種族各不相同，但是他還沒有將「民族」與「種族」區分開來。明確的區分，實則「民族」這一觀念是西洋近代的產物，孫總理將其接受過來，希望中國也要建立一個近代化的一民族國家。」如果照這種說法，我們拿上面所說的觀點來衡量，第一種看法實在不够，而中國歷史上或思想上不獨對自己「民族」地位沒有自覺，同時也沒有發現與之對立的民族存在，我們知道中國人向來抱著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態度。梁任公於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論中謂「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對象」。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一部份人類成為民族團體，也就是沒有「民族的自覺」，其紀，在以前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世界上還有旁的有組織的民族存在，如漢時外族匈奴較大，而前漢書「匈奴列傳」班固的贊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陲，寒露之野，逐草賈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棄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夷堅清之，不與誓約」。這種輕視外族的態度，一直沿襲到鴉片戰爭，如鴉片戰爭時兩廣總督廣坤的奏摺上說：英國挾勞兵致中國的信用平行式，認為莫大的侮辱，可見當時不僅對「民族」沒有「自覺」，即對於旁的「民族」也從沒有認識。這樣看來，中國在以前並無民族問題存在，已很顯明了。

第二種看法，忽略了一九二七以前中國民族問題發展的各階段，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革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當時內部政治的腐敗，外族的壓迫，都是激發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然而斯太林忽略了這些，忽視了辛亥革命之民族革命的意義。就不能不說是斯太林對中國問題隔靴搔癢之談。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民族問題之發生，是由鴉片戰爭失敗之刺激而開始，廣州人民的反英行動是中國民族自覺的最初表現，到那時中國才漸漸地認出了強有力的民族對象之存在，此後的拳亂，也是漸漸認識民族對象存在的表現，一直到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始漸漸地由民族對象之存在意識到民族自

我的存在，在此時提出了建國的要求，至民國紀元前七年同盟會成立，誓詞上除了「驅除達摩，恢復中華」以外，並且要「建立民國」，更足以證明中國已經有民族的自覺了。

四、中國民族問題的內容

有人一定要發生疑問：以上所說的民族問題，其內容是否只限於漢族一部份呢？這却不然，照我們以上所講的民族的定義，是不以種族為限的，漢滿蒙回藏只能算在同一民族之下不同的種族，這樣中國的民族問題從地域上說，應該以全部民族國家為對象，所以在今日講民族主義，並不須倡甚麼五族共和之說，也不要從歷史上勉強的去找新族混和的證據，以驗一個單一民族的理想。因為我們既認民族主義為近代的產物，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承認其在與西洋發生關係以後才產生的，這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謂的「國族」。

上面我們說過，民族建立的阻力，分為內在的封建主義與外在的帝國主義兩種，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阻力，也是這兩種：就事實上來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大小革命，都不出此二者的範疇，此二勢力的發展，互為因果；有時封建主義藉帝國主義的形式出現，如九一八以來的各種偽組織即是；有時帝國主義藉封建主義的形式出現，如一九二七前的軍國內戰即是。因為近代史上的中國政治問題，就只有一個問題，是民族問題。而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論中國一文中很輕率的指出：「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美國民革命軍達到長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即退出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千百萬農民的強大的革命，第二個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個革命還沒有到來，但是它正在到來着」。然而，奇怪得很！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之後，到了現在抗戰時代，又成為革命的主力，這樣豈不是回到第一階段，變成民族革命了嗎？不僅是「蘇維埃革命」還沒有到來，就是「土地運動的農民革命」，也未實現，對於這段歷史的演進，斯大林先生在克里姆宮中，將如何用夢想來解釋？

由上可見，建立民族國家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全民一致的要求，下面我們要從實際上檢討一下。

五、對於建立民族國家功罪的批評

國民黨自成立以來，就負起了建立民族國家的任務，然而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只盡了反帝和反封建這一面的任務，抗戰以來，建立民族國家的阻力，已退到最後的一關，因此亦可以表現建立民族國家的需要已經達到最高點，三年來抗日的結果，更昭示我們，民族問題的嚴重性更是迫在眉睫。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固然一方面要朝外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而這是不够的！我們一方面不要忘了向內看，看甚麼呢？就是消滅一切內在的阻力。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所以在抗戰正在進行的時候，國民黨應全大會提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主張，這就是說，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僅僅抗戰是不够的，而且還要努力建國，這是自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綱上的一個偉大的進步。

其次，我們根據上述的觀察，對「中共」在民族革命中所盡的功能批評一下，在廣州時代，中共參加國民黨所領導的民族革命的結果，對於建立民族國家這一點，曾盡了相當的功能，然而由於中共奪取政權的結果造成南北分裂，以後的江西時代，不僅沒有盡建立民族國家的功能，而且相反地，使我們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停頓了多少年，這是使人最為惋惜的事情！抗戰以來，「中共」在口頭上，在表面上對於建立民族國家這一點，似乎沒有甚麼異議。如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上說：「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但是在行動上所表現的是甚麼呢？無疑地，陝北樹立邊區政府，已經是違背了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原則，前不久更要求陝北樹立特殊政權，更是破壞了民族國家的統一，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決不容許有兩個政府的存在，這是確切不移的道理。

再就建立民族國家的阻力這一方面來說：陝北政權的形式，與封建割據比較起來，誰也看不出甚麼別差。不過前者多一個蘇維埃的旗幟和幾句時髦口號而已，「中共」現在的行動，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只有阻礙的作用，不僅與自己的語言相違背，更是違背全民的公意，阻礙民族國家之形成，委員長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三日對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的表示中說過：「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延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我們認爲中共不僅過去對民族危機無認識，而且就其在的行為而論，對現在最大的民族危機亦無絲毫認識。在對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如果「中共」同人自認是中華民族之一份子，那末就應該有痛切的反省。

說到這裏，我們最好用越飛宣言上一段話來作一結束。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適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急之問題，乃在民權之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總之目前的種種事實告訴全國的國民，中共在對民族問題的嚴重性的認識上說是如何的錯誤，中共的行動是如何的違背了建立民族國家的神聖原則！

論中國青年運動

吳思琦

——史的回顧——

我們青年，未來的中國和未來的世界都屬於我們。我們深自慶幸生在今天的中國：光榮的歷史傳統待我們去繼承，目前的艱難困苦待我們去擔當，續起的民族生命待我們去創造。

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青年人寫下了最有光輝的一頁。中國青年運動必然地要帶上濃厚的政治性。近代

中國一方面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他方面在民族意識醒覺的過程中，敏感的年青人對之豈能熟視無睹？中國青年對中國革命，可說有領導和決定的意義。那些不帶政治色彩的青年組織，就其組織散漫言，就其力量薄弱言，最重要的，就其缺少積極的行動而言，都不能以「運動」稱之。

智識青年又是中國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及其主要動力。在文化落後社會的中國，國人知識水準甚低；智識青年在這裏有其特殊的地位，因而有其特殊的任務。對於外力的壓迫和內部的腐爛，智識青年不僅感覺比一般人敏銳，而且常積極奮起，去喚醒領導一般人與之作決死的鬥爭。

我們檢討中國青年運動的過去，大體上就等於檢討中國革命運動的過去。光緒二年一年庚子為梁啟超策公車一千三百人簽名上書，陳請變法，可說是中國近代青年運動的濫觴。「戊戌政變」一劇，成爲中國近代史上的點綴品，其歷史意義也不容一筆抹煞。這羣青年的士大夫深受中日戰爭的刺激，希望出現治維新的道路來改造中國。「戊戌政變」證明了改良主義的破產，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新醒覺；洒染菜市草上「六君子」的血並沒有白流。特別是「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懼焉」的譜聞同，以其「少年頭」換取了後代人無限的景仰與崇拜。

中山先生看到由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也認識到革命必須有廣大的羣衆基礎，所以組織一部份學生，華僑和會黨來從事顛覆清廷的工作。中山先生壬辰創立澳門興中會時，自己還不過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當日的幹部如鄒士良、陸皓東、陳少白尤少、黃鶴鶴齡等，全是在廣州讀書時候的同學。乙未廣州之役，陸皓東作爲革命最初的犧牲品；接着二十二歲的史堅如第一個因行刺而賣盡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興中會本身雖成就無多，然而後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政治集團，正就是這個簡單組織的擴大。

同盟會因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個青年革命團體的合流而組成，乙巳年八月成立於東京赤坂區、靈南坡本舍彌馬，以中山先生爲領袖，以日本留學生和一部份歐洲留學生爲主要成份。牠號召了大量學生、華僑、

會黨、新軍參加國內連續的起義；徐錫麟、秋瑾等人，都是在這一時期內作了壯烈犧牲的優秀青年。我們每讀「擇沙有殞喪亡是，博浪椎擊豪傑」之句，其慷慨悲歌的情景，不難想像得之！特別在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同盟會全部精英的熱血頭顱，差不多為革命事業而揮洒盡淨！這一次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壯舉，是辛亥革命迅速成功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在同盟會領導之下，其發展有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加上袁世凱以「足疾未痊」的魔術來導演一幕欺人孤兒寡婦的醜戲，努出哈赤的神像，遂即時自祭壇上倒塌下來。辛亥革命的不澈底使國家進入短期分崩離析的狀態，但牠推翻專制君主，頒布民主共和，為建立民族國家盡了清道夫的責任，也開闢了中國和亞洲的新曙光。

民國成立，許多同盟會會員高唱「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諺調，離開了他們的領導者。改組後的國民黨失去其青年黨，而自列於官僚政客之林。討袁失敗，中山先生為除變去敗，將國民黨改造為中華革命黨，後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但其實正復興關鍵，仍在十三年的改組。

民八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大規模的羣衆愛國運動，牠的主力和領導者都是智識青年。當時中國內則軍閥混戰，南北分持，外則日本帝國主義趁火打劫，促進中國的殖民地化。結束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把青島和山東的種種權利作為賄與日本的禮品，而中國參戰的代價却是收回曾為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正在抗頭的民族意識遭受這樣當頭一棒時，遂爆發成爲驚震全世界的「五四運動」。

遠在民國四五年間，新文化運動的洪流已經在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之下開始活躍着，經過「五四」的刺激，遂如大海狂潮般地激發起來。這個新文化運動有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雙重意義，牠的內容就是蔡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和國故先生。所以五四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而且是文化運動，牠是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合流。一言以蔽之，牠是民族意識醒覺的具體表現，是行將來到的

北伐之序幕。

中國共產黨可說是五四運動的副產物。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曾因五四運動漸次流傳到中國，為一些富於幻想的智識份子無條件地接受了；他們又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力量作了過度誇張的估計；加上蘇俄十月革命的刺激和第三國際的慫恿，中共遂以人工製造品的形態出現在歷史上。民國九年夏天以陳獨秀教授為領袖的共產黨小組成立於上海，十年七月中共召集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一時期中，同時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這是青年運動採取獨立的組織形式，並接受一個政黨領導的肇端。

當時推動歷史向上發展的革命動力在南方的廣州。中山先生雖因實際政治活動沒有直接領導五四運動，却深切地認識到因這個運動而產生的新生力量之重要性。十三年一月中中國國民黨改組，使自己成為一個擴大的有嚴密組織的民族政黨。為網羅全國革命青年使無遺漏起見，容許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個別入黨。中共領導人李大釗氏也深明大義，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坦明聲明：「第三國際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乃以個人資格，非以為團作用。」最不可忽視的是當時在黃浦受訓的青年將校，他們在少年英俊的天才軍事家蔣先生領導之下，形成了一支組織謹嚴的革命武力。沒有他們的英勇犧牲，北伐就難於完成其統一中國的任務。

五卅運動及省港罷工是北伐的前奏曲，是反帝的羣衆愛國運動。這一次運動是以工人為主力，而全國學生，尤其是上海學生，確盡了先鋒隊的責任。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都間接直接在國民黨領導之下進行。

當北伐進行到中途時，中共却正在大作其奪取政權的好夢。他們把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誕生的陣容，看為資本主義最後的掙扎。由於先天的虛弱，中共應該去演唱唐吉可德的悲喜劇。想在歷史過程中飛躍前進，其難有類於「挾泰山以超北海」，實心力而為之，適足以阻塞革命的前路。當國民黨在其完成統一任務的十年中

間，幻覺的中共却由產業區域走進農村，失去其應有的工人羣衆，身披「蘇維埃」紅色大衣，以全力從事農民運動，這真是中國革命的大不幸！

更不幸的是牠領導的青年學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十一年五月，通過團的綱領並決定加入少共國際；同年八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黨團關係；十三年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提出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號，並促進青年工人入團；十四年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S.Y.）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十六年國民黨「清共」以後，C.Y.也暫時趨於沉寂，到蘇維埃運動時才復活。

中共本來以學生運動起家，所以一直就沒有放棄對青年學生的運用。北伐前後，牠曾驅使千萬的純潔青年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家庭，去參加所謂革命的偉業。多少青年曾因之葬蕪墮落，多多少少年青的生命曾因之白白斬送，連十三的小孩子也「在數難逃」。這一幕悲慘劇所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永遠不能從人們的記憶里抹去的。那一幕跟隨中共阻撓歷史前進的無窮青年，為歷史巨輪無情地輾壓，當後來中共宣傳放棄蘇維埃運動時，這種犧牲遂變為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日本自取得明治維新良機後，國力上漲，至「九一八」前夜達於極峯而開始下降。日本資本主義的制度，并不因世界大戰而鞏固，反而擴大了內在的危機。唐醫的軍部於是替牠開了一副新方劑，那就是到中國去！歐戰給予中國民族資本以發展的機會，叫中國結束過去不幸的歷史而轉入一個新階段，這階段以「五四」運動為起點，向上發展；如果中間沒有因中共的農民運動而遭遇顛挫的話，則由於民族統一運動告成的環境，中國會和日本帝國主義從事英勇的民族鬥爭，無需等到一九三七年。

可是這段歷史，在「九一八」以後不易為一般愛國心切的青年所了解，他們尤不能了解「攘外必先安內」的歷史要求，所以向政府請願抗日的學生運動在全國海陸空地開展。困難一門的中共及無視事實的左傾文

人復乘機慾意煽惑，希圖減低政府的威望。這一連串學生運動的組織，步驟，和目標都顯得相當零亂，而且以無意義的罷課和質動來使青年人自己荒蕪墮落，失掉一部份青年學生的同情和支持。這些優點和缺點，都在後來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達到極高峯。「一二九」是民族精神高度發揚的發衆示威運動，牠要求統一，反對分裂，要求獨立，反對依附。當一九三五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伸展到華北，冀察自治的委員會草率整個北平市，忍無可忍的全市學生乃在大刀皮鞭威脅之下發出他們悲壯的呼聲，把許多人從夢睡中驚醒，並使帝國主義者的野心為之暫時收斂。這種「應難不苟見危授命」的愛國精神，在暗無天日的雲霧中，充分表現出中國前途的新曙光。但許多缺點却伴隨着運動本身的發展而發展，且以步調日趨零亂，行動日趨紛歧，因為中共的運用和另一些團體不成熟的領導，終至於演成互毀的悲劇，使單純的青年為之寒心！這些時候，共產主義青年團因破中央各派多次的選用，於無形中自成一個系統，自有一種政策，黨與團大有分道揚鑣之勢，後來黨內政見日益矛盾，黨終於用「成為第二黨形式之一個狹隘的團體，失掉了為廣泛的青年羣衆組織之作用」的帽子，決定把青年團取消，而代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及他若干祕密的和外圍的組織。

爆發於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戰爭使整個中國進入新階段。如果說，辛亥革命完成了掃除建立民族國家的障礙物的任務，北伐及其後的統一戰爭完成了統一民族國家的任務，則新階段所要達成的任務，就是民族國家的獨立及其建設完成。這幾項階級，都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伴隨著革命的進程，青年運動也需要不斷的調整和適應。基於歷史的要求，領導抗戰的國民黨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政府並明令解散民先隊及其他帶有政治色彩的青年團體，以謀統一全國青年的組織和行動。這種舉措，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有其劃時代的意義。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現狀，我們在這裡就不論述。

以上中國青年運動的簡略過程，也可說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簡略過程。中國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對於

近代的革命運動，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領導中國革命的蔣委員長曾有言之：他說：「證之我國近代歷史，如辛亥革命之推翻滿清，民國十五六年之打倒軍閥，參加者大多數皆以青年為主幹，其犧牲奮鬥之光榮史蹟，固與吾中華民族共垂不朽。」然而來日方長，大難未已，復興之業，前路方遙。我們今天會重複以嚴肅客觀的態度來檢查過去缺點，好作為今後努力的前車之鑑。

以往青年運動缺點之最大最顯著者在於不注重青年本身的培養。青年人第一要自己鍛造成器，應當不斷的培養自己，應當有健全的青年生活。過去青年都以全力從事政治鬥爭，從沒有把青年本身的培養當作青年運動具體的使命。S.Y.雖會有過這樣的口號，其實際則背道而馳。未成熟的青年如果不隨時注意自身的健全，如果沒有道德知識的養育，他不僅無能完成艱巨的政治任務，有時反被政治運動所摧殘所毀滅，這個缺點的弊害在「五四」以前還不甚顯著。到後來則每况愈下，更至阻礙青年本身的開展。許多青年幹部幼稚卑污的言論行動，會叫許多青年對青運望而生畏。當青年運動為陰謀的政治集團或淺見政客所利用時，參加者就更只有毀滅之一途了。後指揮予中國革命力量以過當的摧殘者，過去中共是最顯明的例證。「是以吾人今日，必需反省過去不能保育青年，領導青年之罪愆」，這段話豈非沉痛的反省？

另一個普遍的缺點便是組織的不統一不嚴謹和思想行動的不一致。中國青年運動既然是一個政治性的運動，牠就和政治運動一樣需要絕對的統一。要不這樣，牠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牠還需要有嚴密的組織，和森嚴的紀律，和一支軍隊一樣。過去的青年運動常因組織鬆懈，意見分歧，步調零亂而陷於失敗或中途妥協。有時各行其是，力量相互抵消，並使廣大的羣衆一哄而散。往事屢歷，無待擇舉。

第三個缺點是青年團體沒有成體系的獨立組織。例如同盟會是青年組織，又是完全的政治組織，須以全部精力從事政治的活動。S.Y.或C.Y.的組織在外表上似乎是獨立的，而實際是中共及其內部各派從事私門的工具，不錯，青年團體負有政治的使命，但為完成組織青年培養青年的特殊任務，牠應當有自己獨立的組

機和特別的裝備。

雖然中國智識青年有其特殊的領導任務，但過去青年運動主要地表現在學生運動方面，仍為無法否認的缺點。青年運動從沒有深入農村和工廠，對工農青年他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其自身組織力量也一向單薄，無由加強。

最後我們要剖析智識青年本身的缺點。智識青年大陸上仍接受了以往士大夫的傳統精神。他們的缺點之表現在青年運動方面，正和這個民族的衰老症候表現在政治方面一樣。最顯著的，他們往往富於幻覺，不切實際，將知識與行為分離。在他們看來，天下無一難事，但當口中所說拿到手中來實現時，却老早逃之夭夭了。他們還沒有具備領導者應有的切實負責氣概。他們又是感情脆弱的人，當興奮時和患難紅熱一樣，一旦消極時又像落在冰池里。易於激怒，也易於悲觀，善於想己，猶善於責人，他們沒有領導者所必需具備的堅定性。和忍耐性。但他們究竟比過去的「秀才」有出息，「造反」常有成就，而且其中亦出現不少出類拔萃的領袖天才。

我們回首往事，一方面感到先烈的赤血白骨不能白白犧牲，同時認為歷史的經驗教訓必須虛心接受。諸目下巨艱，全來日大難，尤為旁皇悚息，不知何以為懷！頭一個為革命犧牲的青年志士陸皓東在他敵人面前說得好：「但我可殺，而繼我起者不可殺盡，公羊既殺，九世含冤，異人歸楚，我說自殺。」是的，我們繼起者決不敢忘記先烈殷殷的期望！「死者為其易，生者為其難」。我們惟有以更堅定更勇敢的步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

陝北內幕

民族思潮 第一期

去年二月，正要離開西安南下的時候，恰遇新自陝北歸來的友人張衡，因向其詢及陝北近況。以臨行倉卒，不及細談，張君乃就其觀感所得，趕草文字一篇，交我帶給南方的朋友們看看。張君在省立延安師範教書半年，他的觀察，比較我個人所見所聞，實在完備深刻得多。雖然時間又已過去一年零十個月，但據最近北方的來信，邊區還是那麼一個邊區，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對於尊重事實而不以耳代目的人們，對於能以嚴肅負責的態度考慮當前國家問題的人們，如果這篇文章能夠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我們的願望就算實現了。再者在中共要求政府明令承認邊區的今天，這篇文章，猶有特殊的意義。

至於這篇文字的發表，在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之前，其責任是全部由我個人負擔的。恩琦廿九年十二月
~~陝北情形~~在一般人心目中，始終為莫大之疑團，
連年來，雖前往考察者日肩櫬篷，思有探其真象實情，而結果，其所見所聞，多屬皮毛。尤其以各人之立場不同，秉筆論述，多出主觀，皮相之跡，在所難免。
，工部詩云：「前登塞山重，屢得飲馬窟……鴟鴞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即指此地。自汽車中外望，除每隔數十里輒見一二持矛之老農外，邊區並無若何特點，外間所傳如何如何者，均屬子虛。惟荒涼之感，不減工部當年。車至二十里鋪，遠見延安城外，浮屠高聳，而附近荒山，聚窩洞無數，有似佛龕，吾人之立場，詳考其成敗得失，自信耳聞目擊，尚不至悖實太遠，茲不措意，將所得公諸友人。

(一) 延安轉席
自西安至延安，七百里中，有惡劣之公路相通，洛川為此路上最繁華之城市，由此向南至耀縣，所謂三不管之「統一戰線區」在焉，由洛川而北，乃漸入中共所統治之陝北邊區矣。此地人煙稀少，景象蕭瑟，早晚寒不能耐，蓋為黃土之高原氣候也，城中亦有設備較精良之旅社飯館，出入者亦衆，而一般人民兵士及學生等，多食小米，以此地物力艱難，米麪甚多之故耳。

延安城極古樸，矮屋梯比，氣候無常，初來此地

(二) 中共之訓練工作

抗戰以來，中共擴大實力，其途有二：一為軍力之保持與擴充，二為青年之吸收與訓練。改編之八路軍多在河北山西，駐留邊區者少，其詳不得而知，惟青年之吸收與訓練，則純以延安為中心。紅軍大學改為抗日大學以後，內部注重政治與軍事兩方面之訓練，各地青年奔赴陝北者，道途相望。其第一期學生僅有七八百人，其後遞次增加，至第五期達萬餘人，今則添設慶陽分校、瓦窯堡分校、五台山分校、晉冀察分校，以為大量網羅青年之所。陝北公學訓練比較懶懈，除本校設延安外，又有栒邑分校，人數亦在二千以上。對於生活散漫難於部動之青年則設有魯迅藝術學院，亦在延安城外。此外尚有祕密設立之馬列學院黨校，其内幕非一般人所能探悉，但可以確知者，即黨校只收兒童，加以嚴格訓練，使成黨之未來幹部，馬列學院則收羅對理論有根基之份子，從事研究工作。又為訓練技術人才起見，設有日文軍官等專門學校。抗大內容頗值一述：其中分預科本科，預科二月，本科六月，預科之主要課程有三：一、中國問題，教本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此書根據聯共觀點來看中國近代史，強調工人在近代革命史上之決定作用，而指中共為不折不扣之工人政黨。國民黨在

革命不適為社會主義革命之低級階段。此種論調對中國革命前途之影響如何？自不難想像。二、政治常識，其書為「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由中共理論家集體創作，即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敍述歐洲與中國之社會經濟發展史，對中國現階段革命之性質尤詳加說明，務使學者堅信中共今日之行動並無任何矛盾與錯誤。

三、戰略與戰術。此項功課由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之紅軍老幹部講授，彼等出身，多係農村流民無產者，講授多為「戰鬥經驗」，聽者索然寡味。前兩項功課由中共趕加訓練之外來知識份子擔任，而其知識水準亦參差不齊。有一班「中國問題」課即由一公路測量員擔任，會使學生大不滿意。而號稱名教授之艾思奇等，則為工人大隊之專利品。抗大師資之低劣，中共自己亦不否認。本科科目有哲學（即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三民主義概論（用他們自己編的教本

」等，而軍事訓練則重術科與野外演習。學生上課盡在戶外，各人隨身攜帶木板凳一個，各班程度至為不齊，上起中學教員，下至逃避兵役之壯丁，對於上課一事，一則感覺毫無意義，一則莫名其妙，而中共美其名曰「集體學習」。

「開會」為抗大重要訓練方式之一，校中會議之繁多，筆難盡述，主要者為小組會議，討論各種理論上或實際上的問題，此外有生活檢討會，晚會，各種

研究會，各種座談會，各種講演會。會議之多，固足以增進同學間之感情，但既不自然，又為被動，一般同學均感索然，有浪費時間之苦。如去歲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參加各校學生及中共要人如何仲平丁玲等甚衆，柯仲平等聲如瘋如狂，而台下學生却沈寂異常，僅報以零落之掌聲。筆者初見此種情形，深為駭異。

又「救亡堂」在延安至為耳熟，蓋學生活動之中心地點也，每隊各有一「救亡堂」，受隊政治指導員之指導，其活動為牆報，文化娛樂，體育等。

學生活思想各方面，校中管制相當嚴格，行動靈活不受限制，此種措置，與其平日之「民主」口

號大相逕庭，於是乃高唱：「發揚政治民主的精神，發揚軍事的集中精神。」因此所有統治，無不以「軍事的集中精神」為藉口。統制之人在大陸為大陸委大隊政治指導員，在隊為隊長及隊指導員，大部均屬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之紅軍老幹部。其中真誠者尚不乏人，而諸其能力學識，莫不足以領導青年。其暴躁之性情（此點或者與彼輩至今為單身漢有關），雖盡力掩飾，亦不時暴露。

除上述種種訓練方式之外，中共復有所謂「黨國作用」，務使黨員的學生在非黨員的學生中起模範作用與突擊作用，再將可以吸收者吸收之，此外「民先隊」在學生中亦異常活躍，吸收隊員，其工作則無非為貼標語，唱救亡曲而已。

(三) 在陝北之青年

受中共的宣傳而來陝北之青年，年多一年，其中亦不乏忠誠有為之士，但如謂所有來陝北之青年均懷純良之動機，則亦不然，事實足資證明者，即何嘗方論陷，則何省來陝北之青年必徒增，其實尚不止此，甚至有為找尋對象而解決性煩惱來者，有逃兵役之

壯丁，有開小差之憲兵或小兵，有無可無不可而來觀光者，有憤世嫉俗思一逞其英雄主義者，亦有因身患梅毒無處容身者，（有一患梅毒者，被學校發見後，強令退學，某日毛澤東正向學生講演「新階段」，彼起立向毛主席呼冤不已）。而中共爲增強實力起見，對此諸流品複雜之份子包容並收。據筆者所確知，羞與嗆等爲伍，而有志青年莫不因之氣短。

來延安之青年，均先暫在招待所居住，聽候個別談話及編隊，所謂招待所者，不過房屋數間及小米飯二頓而已，（飯碗須由學生自己向人民借用，人民不堪其擾，有時怒形於色）。反之，凡中共認爲值得盛情招待者（如左傾的文化人），則另有副官室供其食宿。二者苦樂懸殊，有天壤之別。抑有甚者，即招待員之愚昧無知，千里遠來之青年常受其侮慢與苛責，

舉目無親之際，惟有容忍而已。入學校以後所受之訓練，已如前述，住室爲窑洞，多由學生自己建築，據

云：一旦學生人數減少，多餘之窑洞，即可作兵營之用。吃饭每日爲小米飯三頓，每頓每桌小菜一筒，每星期則食羊肉（間有豬肉）少許。學生之貧苦者，無

法注意營養，面有菜色，爭食燒餅。同學間性的關係並不過份紊亂，而當局則頗放縱，允許學生星期六可以不歸院居住。來陝北之女人爲黨人所誘去者極多，因其轉戰萬里，仍孑然一身，性的需要甚強，當局有時予以協助，藉爲報答。

由於上述情形，吾人敢斷言，調練未畢或完畢后悔悟而思去者決不在少數，中共對此輩，首則施以懲

嚇，謂中央憲兵沿途如何檢查，對青年如何殘酷，決不可單獨行動，如此無效則繼之以威逼，勒令學生往山西過同蒲路參加遊擊隊作戰，此輩學生平日之軍事訓練至爲鬆懈，復少操練真鎗，其命運如何，不能想徵得之。因自彼輩觀之，所謂小資產階級之知識份子，并非革命之基本隊伍、以其只有在革命高潮時始革命

青年在陝北之命運，茲再舉數事，以明其可哀：中共領袖表面上與羣衆接近，實際上，無法問其生死，前不久延安遭敵機第一次轟炸，軍民從無空襲經驗，又無防空設備，炸彈着地，始張皇逃避，僅一當店之前，即死青年數十人。又筆者此次回西安過宜君時，見有青年三人，形同乞丐，叩之，蓋不滿中共而私逃者也，彼等詐稱抗大畢業生，得購車票三張，乃押車人中途發見其偽，即迫令下車，毫無憐惜之意，其中有一人為北平學生，且為當時民先隊發起人之一，自稱逃出延安與脫離苦海地獄無異，筆者聞之，同情之淚，潛然而下。筆者又憶另一事實：即抗大招收學生時，櫻明不分黨派，有軍校學生二人進入該校，因處處遭受歧視，心煩意亂，某日與隊長偶因小故不睦，隊長乃招集全隊學生，領導高呼：「打倒法西斯帝國！」以為報復，此二青年者，乃倅然無對。

(四) 陝北之人民

全邊區據云有居民五十萬人，所謂「土匪」者均已為中共所驅逐，全國居民均依耕作此貧瘠荒涼之寶土為生，所有民衆，不論老幼男女，皆納入組織

之中，壯丁編入自衛軍，年老者編入老人隊，兒童編入兒童團，少年編入少年先鋒團，婦女入婦女會，即於窮鄉僻壤，亦無不有中共黨員為之指導訓練。主要為自衛軍，十餘人為一班，三班人一排，三排人一連，三連為一營，三營為一團，三團為一族，族團營排長悉由農民擔任，平時散居從事農工業，有事則調集聽候驅使，民二四團甘泉，龜勞山之紅軍，一部份即農民自衛軍也，筆者曾與一自衛軍張姓排長細談，據云：此種組織至為鬆懈，且除刀矛以外別無武器，更不足以語戰事也。

陝北因歷年災患，人民不懂生活貧苦，文化亦甚低落，中共雖力倡禁煙，據吾人目睹：吸食者猶大有人在。延安城內居民情況較好者即不甚多，農民生活，尤為艱苦，日常食品為小米及蔬菜。整個中共即寄生於此輩可憐蟲身上，怨尤之情，可於想像中得之；惟人民或因慘痛之經驗，故多敢怒而不敢言，筆者曾詢一農民：「八路軍好不好？」彼答云：「八路軍吃我們糧，你說的好不好？」

(五) 逃區政府和民主問題

不鏽，見滿即號，不共處，人膚止七直，現設政權魯政未府，僅觀重。一以坦能政感或。施縣八接非舉於一，實食，員見，宣察毛，但般外白辭策受造又飛政十出使校陝人中域局民，中邊「傳，澤使愈來，言其固威謠侮邊府人頭工，北民共已，政尤央區陝民亦東有重陝有之咎應脅侮場於包，作飛。選一重審廳資頤政富主不謂志傳北何，負而蔑唐夫郊圍但入機中舉方新計，反佈府富主之統之知無所一無，施被外兩利員場共」而劃委建證之之邊而從民士為左證非謂部可或縣擇開次用向等在之承改會廳邊令立政府且邊主氣中傾可為多份如咲政去拙，卒其」邊官中名等，據府向富為短共的旨過加責何使府二密又搞頭亟內，央，，教政而云「政內邊，最文？去二任，商科人洞於亂不施，於政非組育府中經之前要出特之一人舉并五而所斷長，。冠機，止無對是府復織廳之中央前身求綠色任特，措無千其以絕利施泉，施其手央重命觀如法織邊認即西北民毫點揚色對之賴里各用保縣炸里流安政後，縣辦假政府之矣省院：固主之，昧，於乖，長幹是橫張隊府，關府官。政，主政合北中國統此彼謬除征部之食調隊被，府不以「之吏，府保庸府法但主吾治所輩，熟行調隊被，安之之，其司下官但蘇上。用也才深中式幹昧者學安擾一人裝共其係狀時下令分吏吾雜上，中顯。不表之與部，校師去次民交機威政乃又之部祕為人行，謂參從政正共微能不事口者實中處範二，禁案關望府出自

莫蓬當或「是之同舉虛通衛，食，因「抑新通曲為之嚴任如明護會學有衆隊學實為過軍凡之自為你為華求解其：，其前其首議校此甚人長相況與所。之曾不缺然你們民日不三澈中如作中共鑿至僅乏說們同主報得民底共斯認領袖說，話在學殿中。主實口作誤宣張咱陝恩，話在學殿中。主實口作誤宣張奧諸至生有幹贊代日何。真也口中大一的成為過歛抗之。貌途會專人，提短？大普，，，都使出，某學遍蓋乃台足可之彼無人生選業出角資以負因法某者舉目高有述現救然名選領度隨呼先：出亡關，畢導，之：埋延來室係而教民擴附「伏安。」相在亡衆吾和擁之每」長識一室之人，護呼次卽時者旁負幹視而中口翼如期之負責部察初共號衆此之姓指人也，來」者大耶責名導，，完者，，會？任，責始共全固「每，，於任因還為

(上) 中共領袖及其幹部
世所咸知。中共之領袖為毛澤東朱德，而其餘在延安外人所然知。彼等常等機車下級接近，如朱德在延安時，間參加學生運動，毛澤東朱德少出言階級，甚為留神些。
（下）中共領袖及其幹部
南。其語行，動遲緩，眼睛常閉，學生座談會等，毛氏身材甚高，見陽光者，操道地音，何必說小資產階級底？
「我們本都是小資產階級底，」在一別人的地方，
「我見過，」毛澤東說，「在河旁洗衣服，長官則使用熱水，此即所謂同艱苦也。又延安洗車站長對乘客特別是學生，之厲聲呵斥，與普通無異，實使見者驚訝。

（七）總結

以上所述，掛一萬鈞，惟無一非目睹之事實，以證其言，見淺陋，未敢妄加論斷。孔子曰：「始吾公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所見，可觀其所由，察其所作，安人焉哉！斯言可信，則交黨之作，或不無裨益於知者，南中友好，幸垂察焉。

（八）總結

總結見淺陋，未敢妄加論斷。孔子曰：「始吾公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所見，可觀其所由，察其所作，安人焉哉！斯言可信，則交黨之作，或不無裨益於知者，南中友好，幸垂察焉。

民族思潮 每月二十五日出刊

總編輯人 吳東民

總發行人 李兆民

零售每本三角
訂閱全年貳元伍角 半年壹元伍角

代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及各大書局

印 刷 所 昆明書畫街一〇二號

總 球 公 司